

第一章 俄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 文学在俄国的传播

俄国古称罗斯，国家的形成较晚。九世纪末才成为一个早期的封建国家——基辅罗斯。但其发展过程后来又被蒙古的入侵所打断，蒙古贵族统治罗斯达两个半世纪（1240—1480年）之久。十六世纪俄罗斯国家开始重整。十七世纪初叶，1618年（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凡·彼特林奉托波尔斯科督军之命，出使北京。随后又有几次人员的往来，从而开始了俄国与中国的外事交往。最早描述中国问题的著作则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由外交官尼古拉·斯帕法里（1636—1708）完成的，他于1675—1678年任俄国驻北京的使节，所著《尼·斯帕法里率驻中国使团的文件存档》（1675—1678）后于1906年出版。随着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公元1689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两国之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的来往也日益发展，双方都有了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需要，这时便开始出现培养人才和造就学者的工作。

第一节 俄国汉学的兴起

正如西欧的汉学起始于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一样，俄国的汉学也大抵从十八世纪初开始着手酝酿。1724年彼得大帝下谕旨建立帝国科学院，后聘请德国东方学家、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作者拜耶尔（1694—1738）任帝俄科学院院士，旨在帮助俄国人借鉴西欧的经验以建立自己的汉学。

真正的俄国汉学却始于俄国驻北京的教士团。从1714年起俄国派东正教教士到北京，称为俄国东正教使团，每十年派遣一次，至1949年为止先后派遣过二十次。除了传教，在1860年俄国在中国正式设公使馆之前，东正教使团既是沙皇政府实际上常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又是俄国培养汉学家的基地。其间，根据1727年（清朝雍正五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俄国在派遣东正教教士之外，还可加派一定数量的学员入馆学习。这些东正教教士和留学生除学汉语还兼学满、蒙、藏语以了解并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他们充当中俄交往事务的译员，有的人成为学者和汉学家，著名的如伊拉利昂·罗索欣（1707或1717—1761）和阿历克塞·列昂季耶夫（1716—1786）等，都译过不少中国的哲学和历史学著作，是俄国汉学的开拓者。

罗索欣是俄国第一个汉学家，通汉、满语。1729年他作为东正教使团第二届学员来北京，曾在国子监习汉、满文，1741年回国任科学院翻译，并讲授汉、满语；有翻译手稿近三十部，主要为史地著作，如《中国地图》、《阿尔泰山记》、《八旗通志》、《二十四孝》、《三字经》、《千字文》等。

列昂季耶夫是东正教使团第三届学员，1743年到北京，1755年回俄国，在外交部和科学院任职，1763年在彼得堡开办汉、满文学校。从1771—1786年，他出版的著译有二十一种，还有大量手稿，内容涉及中国史地、政法、哲学以及中俄关系等，主要的著译除与罗索欣合译的《八旗通志》外，还有《中国思想》、《大清会典》、《大清律》等。其中《大学》（1780）和《中庸》（1784）都是首次出版的俄译本。

由于这两个人的贡献，《三字经》等一批中国书籍得以在俄国传播。根据1727年恰克图条约而在北京设立的俄罗斯馆，其历届的汉语教学都以《三字经》为课本。此书易读易记，对外国人学汉语尤为适用。它那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的内容，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尚之捷径。在学习过程中，罗索欣第一个把它译成了俄文（译稿现存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他于1741—1751年在彼得堡办华文馆时，还把此书作为教材使用。到1779年，列昂季耶夫再次将它译成俄文，而且收入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公开版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内，开始为公众所了解。次年，官方的《圣彼得堡通报》甚至正式评介这本“诗体箴言”，使该书在知识界进一步流传。①

俄国汉学兴起的原由，应该说首先是出于两国交往的需要，特别是我国清朝康熙在位年间，和俄国彼得大帝当政时期，两国交往的频繁更促进了俄国汉学的发展。

此外，俄国汉学还受十七、十八世纪西欧“中国热”风气

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

的影响。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纪初实行改革，厉行欧化政策，把俄国人的眼光引向西欧。那时，中国与西欧已建立海上交通，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德等国的知识界瞩目中国文化，宫廷和上层社会热衷于中国文物，甚至仿建中国式的宫殿和庭园，这些都引起了俄国人的注意。正如研究俄国与西欧文学相互关系的苏联学者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所概括，西欧传教士“原以为会向这些野蛮人表明欧洲的优越”，结果相反，“他们一来到中国，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古老文明的力量，承认其艺术的完美和哲学思想的精深。他们从各种角度对比中国和西方世界，结果表明这种对比在许多方面不利于后者……他们便以所写的东西在本国有力地唤起对中国艺术和哲学的迷恋”，“这种热潮在一百多年间深深地吸引了欧洲精神生活的所有流派”^①。这种情况，在俄国也不例外。俄国人也同西欧一样搜集瓷器、漆器，按中国风格装饰皇宫住宅，热衷于园林艺术，还在彼得堡郊外的奥朗宁堡（现名罗蒙诺索夫城）建起了一座“中国宫”（建于1762—1768）。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夏宫，也于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1777和1784—1788）增设了中国式的蓝色客厅，同时在夏宫的花园里增加了中国式建筑——一座中国剧院、两座桥和几座楼台亭阁等。如今来这里参观的人，还能发现宫中保存了许多中国雕刻、丝绸饰物、瓷器、漆器以及其他工艺品。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方面，俄国也紧跟西欧，他们不懂汉语就从别的欧洲文字转译。我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在1731年自法国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成为最早传入

米·阿列克谢耶夫（1896—1981）：《普希金与中国》，《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

欧洲的中国剧本，后来又被转译成欧洲其他文字，在欧洲广为流行。俄国人B.涅恰耶夫于1788年将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根据此故事创作的剧本《中国孤儿》译成俄文。在此之前，俄国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于1759年从德文翻译了《中国悲剧 孤儿的独白》。有些著名作家还写诗著文谈论中国。诗人杰尔查文在《废墟》（1797）一诗中就歌颂了皇村中的中国花园：

这儿是剧院，那儿是秋千，

这里——小屋里充满亚细亚式的安乐温暖。

作家拉季舍夫则写了《论中国通商》（1793）一文。

俄国汉学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本国社会思潮的作用。自从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实行改革以来，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了全面的推进，社会思潮比以往活跃，文学也在加紧探索民族的独特性，希冀赶上西欧近代文学的水平。他们的办法首先是借鉴西欧。以文学为例，他们把西欧从十七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诸种文学流派都引进来试用，终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欧文学几百年的历程，迎来了十九世纪本国民族文学的大发展。同时，他们也注意东方，特别是中国。十八世纪的知名作家康捷米尔、拉季舍夫、杰尔查文等就一再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①。叶卡特琳娜女皇时代的俄国杂志还刊载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译作和文稿。当时的社会潮流，一方面要宣传彼得大帝改革的成果，加强统一，维护王权和专制国家。罗蒙诺索夫写的颂诗（1747）中就把彼得大帝奉为榜样，确信通过改革，“俄罗斯的大地能

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顿”，使国家迅速繁荣富强起来。而人们宣传“中国的贤人孔夫子”^①，赞叹中国道德的完美，甚至强调《三字经》里的“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以说明中国官吏制度的“开明”等等，显然也是为加强沙皇制度和发展俄罗斯国家服务的。另一方面，启蒙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人们对于专制制度，特别是女皇“开明专制”的伪善也很不满，便拿俄国的现实同中国（当然是把中国王朝理想化了）相对照，以达到揭露和讽刺的目的。作家诺维科夫主编的两家杂志就是这样做的。在《雄蜂》，1770年2月出版的第8期上登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中，强调中国宋代理学家程颐“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以讽刺俄国女皇所作的“开明政治”的许诺“虎头蛇尾”是“始锐而不克其终”，戳穿了女皇“开明”的伪装。在1770年7月出版的《爱说闲话的人》第2期登了《雍正帝传子遗诏》，就把雍正说的“勤求治理，抚育蒸黎，……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当作理想世界，用以对照女皇属下的俄国“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见该期杂志讽刺俄国现实的诗《致仆人书简》）。^②两文的译者均为汉学家列昂季耶夫，后来均收入其中国译文集《中国思想》（1772）一书中。

① 诗人普希金语。

② 宋昌中：《诺维科夫与程颐和雍正的两篇俄文译文》，《国外文学》1985年1期。

由于诸种因素的促进，俄国在十八世纪共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一百二十种^①，其中主要的是中国书籍、文章的翻译、注释和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还谈不上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尽管如此，早期的俄国汉学家的活动仍然为科学的俄国汉学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和他的后继者

俄国汉学最终形成为一门科学的时间，应该说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其标志是：一、出现见多识广、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汉学家，二、汉学成果已不仅仅是翻译，而是从搜集资料、译介作品进而做分析研究，并撰写著述，三、有成形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建立了培养人材的院校。

俄国汉学初起时，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主要是从帝俄对外政策和对华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局限性很明显。从十九世纪开始，汉学才逐步超出这种局限，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反映十九世纪上半叶汉学的最高成就的，首推比丘林。

雅金夫·比丘林（1777—1853）原名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1799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当修道士后取法号雅金夫，曾任喀山某修道院院长、修士大司祭等职。1807年任第九届东正教使团团团长，于1808年1月到达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在京居留十四年，习汉、满、蒙、藏语。为解决学汉语的困难，他着手编汉俄辞典。比丘林有着编字典的科学原则，认为其基本词汇应汲取生动的口语，便穿上中国服装到市场和商店去，指着物品一一询问，记下汉语的名称和读音。他先后编了六部字典，其中的一部《汉俄读音字典》后来于1922年出版。他编写的《汉语语法》从1835年出版开始，先后作为恰克图汉语学校和喀山大学东方系的教科书，直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仍然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课本。此外，他于1831年在恰克图创办并亲自任教的第一所汉语学校（1831—1861）时，所制定的学制、教学计划和教材，也为后人所师承。这一切都为俄国的汉语教学从方法论上奠定了基础。比丘林另一方面的贡献是率先开展中国问题的研究，他不但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如《四书》、《西藏志》、《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北京志》、《大清统一志》等，而且早就向东正教事务总局写了一封长信（1816年），阐明深入研究中国的必要性。自己则陆续发表许多论述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文著，如论文《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教育观》、《由孔夫子首创，其后由中国学者接受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原则》等，著作有《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教育》（1840）、《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中国的农业》（1844）、《中国的民情和风尚》（手稿）等。据他说，他整整十三年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一个人的成就比所有东正教使团在过去一百年的成就还要大四倍。^①就是在受东正教总局审判后关押在瓦拉姆修道

《俄国汉学的比丘林时期》，《远东问题》1975年第1期。

院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也没有中止著述。由于深入研究，他终于有独到见解，能够对西欧汉学家“总爱用阴暗笔调把中国写得一团漆黑”表示不赞同。他的活动曾经引起普希金和十二月党别斯杜热夫等人的兴趣而同他们建立友谊。也许由于十二月党人朋友的影响，他在五十四岁时曾决定脱离教会（未获批准）。据同时代人马利诺夫斯基的日记，这位受总主教指控而关进修道院的僧侣比丘林，已经怀疑灵魂不死，而且“认为基督并不高于孔夫子”。^①

比丘林把研究同翻译相结合的经验，同样可作为俄国汉学家的范例。他靠自己努力钻研，深切了解《三字经》的知识容量和社会影响，认定它是“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便于1829年将它重新译成俄文，由彼得堡根茨出版社印行，不但写序、加注，而且附原文，名为《汉俄对照三字经》。仅此一例便可说明他在学术上的创造。当时《文学报》（1830年第1期）的书评^②就称赞它的特色，说“雅金夫神父翻译出版此书，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由于他在“书中阐释了中国人的—切哲理思辨，并附带解释那些令欧洲人感到陌生而难于阅读其他中国书的概念和词语。”又说：“该书附有中文原文，这使所有真懂和假懂中文的人皆可—将译本与原文核对比较……不再是胡乱猜想”，这确是“最好的方法”。难怪比丘林的译本几十年来一直被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作为基础读本。比丘林由于在历

转引自米·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

有人推测此篇未署名的评论作者是普希金，虽未有定论，但至少该期杂志是经普希金编辑和校阅，可见比丘林译本所得到的学术评价之重要。——

见米·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

史、地理、民族学和语文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等杰出贡献而成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于1828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汉语教研室，是俄国汉学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汉学在国内有了以高等教育为依托的基地。喀山大学创办于1804年，不久即于1807年建立东方系。该校不但是著名的古老大学之一，而且是俄国东方学的摇篮。1827—1864年由著名数学家、非欧几何学创始人之一洛巴切夫斯基出任校长，正是由他倡导成立汉语教研室的。教研室主任由曾参加第十届教士使团在北京居留十年的西维洛夫（1798—1871）担任，他讲授汉语，编了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1840），还提出为（古）汉语加标点符号的想法。这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推动俄国汉学发展的重要学者之一。教员中就有瓦西里耶夫（1818—1900）这样有远见的汉学家，是他开始讲授中国文学的。他在1850年12月10日对学生开讲的序论是：《论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意义》。他指出俄国知识界不甚了解中国，“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难道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惭愧吗！’因而他主张‘把汉学纳入教育范围。用研究其他所有学科的同样方法来研究汉学的各个领域’”。①

从此，俄国汉学除了驻北京教士使团之外，增加了喀山大学东方系这个基地。

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喀山大学东方系汉语教研室（1837）、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55）、俄国皇家地理学会

彼·叶·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略》第19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

(1845)、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1851)相继设立之后,俄国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汉学家,如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作者瓦西里耶夫,第一部汉俄大辞典的编者卡法罗夫,研究中国土地所有制史的伊·扎哈罗夫(1814—1885),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神话的谢·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研究中国民族学和古钱币的阿·伊凡诺夫斯基(1863—1903),翻译《论语》和《孟子》的巴·波波夫(1842—1913)以及稍后(二十世纪初)出名的他们的学生辈如翻译《韩非子》的阿·伊凡诺夫(1878—?)、研究中国物质和精神文化史的屈纳(1877—1955)和研究义和团起义的阿·卢达科夫等。其中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卡法罗夫(世纪中期)和瓦西里耶夫(世纪中、后期)。

巴拉第·卡法罗夫(1817—1878)原名彼得·伊凡诺维奇·卡法罗夫。巴拉第是法号。他曾就读于喀山教士学校和彼得堡神学院,曾于1840—1847、1850—1858和1864—1878年三次来华,共居留中国三十多年。头一次是作为第十二届教士使团成员,后两次分别为第十三届和十五届的团长。他研究中国史、蒙古史和佛教史。主要功绩是编纂了一部两大卷的《汉俄大辞典》,死后由巴·波波夫续完,于1888年出版;同时还写了一系列论文。亚洲司曾出版第十三届《俄国驻北京教士使团成员文集》(四卷集),这是革命前俄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集。其中第四卷(1866)所收的全部是卡法罗夫的论文。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汉语教学有了变化。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1855年8月27日在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并停止其他院校的东方语言教学。喀山大学东方系的汉语教研室

办了十八年之后也于当时随东方系一起并入彼得堡大学，由瓦西里耶夫任教研室主任。他不但讲授汉、满语，还开了中国文学、中国和满洲的历史地理等课程。从他主持制定的教学大纲看，1863—1865年，大纲均列有广博的课程，其中包括《四书》、中国的报纸、历史及文学史的著作选译以及佛教史等。

两所大学先后的教学经验证明，大学培养的汉学人材，可以在具有高等教育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成为专才，是一般的汉语学校或讲习班所不及的。它们在教学的同时，还开展对中国哲学、思想、历史以及文化问题的研究，凭藉人员和图书资料齐备的条件，很快就成为汉学研究中心。1855年以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便是帝俄国内唯一的培养汉语人才和汉学研究的中心。

俄国汉学在十九世纪尽管有很大发展，但其进程仍是步履维艰的。首先是人材缺乏，不能满足需要。除教士使团外，国内培养的人材极少。喀山大学时期（1837—1855）由于两国交往和贸易量不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薪俸低，加上汉语难学，这都使得入学人数逐年减少，毕业人数还不及入学的一半。彼得堡大学时期（1855以后）招生人数也不多，1855年第一届汉满班学生仅3人，1859年招生5人，1860年招生8人（当年四个年级总计才11人），1867年招生11人，1875年招生最多，也才15人。淘汰率又高，平均每年仅有1、2人毕业。^①1887—1900年共有26名毕业生，还不够当时需要量的百分之一。该校东方系从创办到革命前的六十余

年里毕业的汉语人员还不足百名。①十九世纪末由于形势变化，才于1899年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开办了一所东方学院，主要培养行政和工商业界的翻译和实际工作者。该校学制四年，设有汉语，神学，英语，东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还有国际法，会计、商品学等课程。它从1898至1916年共培养三百余名学生和二百多名军官，多少弥补了人材的不足。

其二是汉学的译作和著作出版发行困难。大量的译著手稿只好存档，或在作者身后才能出版。这都妨碍其传播。比丘林的著作《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按广告来预订者仅有华沙的一名官员，后来也只卖出30本。他的另一本书《中国农历》只售出5本。据比丘林自己说，为出版这两本书，他亏损两千五百银卢布。②

第三节 瓦西里耶夫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俄国虽然早就注意中国文学，十八世纪便有人开始译介，但在近百年时间里只有零星的几篇文学译作。即便在十九世纪，译成俄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为数不多。据现在已知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整个十九世纪发表的中国文学翻译作

《俄苏中国学手册》第107页。

《俄国汉学的比丘林时期》，《远东问题》1975年第1期。

③彼·叶·斯卡奇科夫《中国书日》，1932年版第465—474页，莫斯科，并参阅该书1960年版第485-882页。

品和评介文章或论著仅约共50种，其中翻译作品约占32种，评介文章和论著18种。翻译作品中知名的如1827年出版的《玉娇梨》（片断），1832年出版的小说《好逑传》，1843年发表的《红楼梦》第一回，1847年出版的《琵琶记》，其他多是一些诗歌、笑话或民间故事及传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译介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若干篇，如1878年《新作》杂志上的《水莽草》，还有1883年瓦西里耶夫翻译发表的《阿宝》、《庚娘》、《毛狐》等5篇，1894年发表的《李娃传》。当然俄译诗文中也有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1874年发表）这样的名篇。还应当注意到当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往往不是根据中文原作，而是从其他欧洲文字转译。《玉娇梨》即转自法文，有些诗转自德文，《好逑传》则是先有英译，转成法译后再译成俄文的。有些译文至今未查出其中国原作是什么，许多译文只有未及出版的手稿。可见中国文学作品在俄国流传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

除了翻译作品，中国文学传入俄国的另一种方式是俄国人写的评介文字。在前面谈到的18种评介文著中有不少是述评式的文章。如《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从1868至1872的五年中，每年都有一篇《中国文学新闻》（北京通讯）。

《东方评论》1890年第6期发表汉学家阿·伊凡诺夫斯基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方部博物馆的讲稿《中国人的美文学：小说、章回小说和戏曲》等。这类文章虽然不长，却因是登在刊物上，无疑能造成更广的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学。俄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祖国纪事》1843年第26期发表的随笔《中国纪行》及文中所附《红楼梦》头回片断的译文，

就曾引起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赞赏”^①并加以评述。

在俄国人写的数量不多的评介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80年问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作者是著名汉学家瓦西里·巴甫诺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

在比丘林广泛译介中国的史地、民族和文化风尚，卡法罗夫编出了《汉俄大辞典》之后，开展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翻译及研究已经有了更好的基础。瓦西里耶夫便立志要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他应约为东方学家柯尔什主编的《世界文学史》撰写中国文学史部分。这部分写成后与古埃及以及印度文学史合编为《世界文学史》第一卷，同时也出成单行本。瓦西里耶夫能成为俄国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家决非偶然，而是同他深厚的学问和汉学修养有关。

瓦西里耶夫出生于下新城（诺夫戈罗德），1837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东方语言科，1840年作为第十二届教士使团学员到北京，居留10年，学通汉、满、蒙、藏语，此外还通晓日、朝、突厥语和梵文，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从1851年起，先后在喀山大学（5年）和彼得堡大学（45年）东方系任教授共50年，为俄国培养了大批汉学家。他的研究涉及历史、宗教、地理、文学，发表著、译几十种，还有大量手稿（存档可查的有140种）。主要著作为：《佛教教义、历史、文献》（三卷，1857—1869），《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附《契丹国志》和《蒙鞑备录》译文、

博格拉德、李福清：《俄国汉学家德明，他的 中国纪行 和 红楼梦 部分译文》，《亚非人民》1983年第6期第78—87页。

1857)，《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和《中国文学史纲要》。他成绩卓著，于1866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升为院士，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院士。

我们在喀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看到一本该书头版的珍品。这是一部大32开本、用革命前的旧文字印行的书，163页，译成中文当有十余万字。封面印有：“《中国文学史纲要》（β·Φ·柯尔什和K·A·李克尔主编《世界文学史》之一部分）Φ·巴·瓦西里耶夫 圣彼得堡 M·M·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 1830年”等字样。封面右上角有瓦西里耶夫的亲笔题字：“赠予瓦·马·弗洛林斯基 谨表敬意 作者”。

作者在“几句开场白”中说明，他很乐意应约撰写这篇篇幅不大、普及性的中国文学史概述，将力图为这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开辟一条新路。其办法就是“在书中不援引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而是扼要地概括自己过去和现在备课写讲稿时的文章以及笔记”，他特别说明，“我写这些讲稿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是中国的书。我所论析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是我亲自阅读过的。”（第4页）。瓦西里耶夫这种科学、认真的态度，不但从全书绝少转述中国书以外的学者的结论，而且从他长期的准备工作都可以得到印证。他早在北京留学时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学，竭尽全力搜购各种图书，每购到一本必先仔细阅读，回国时带去汉、满、藏、蒙文书籍849种共2737册。因而一回国就能立即在喀山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并在彼得堡大学继续讲授。他可以说是欧洲最早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因为“在1893年以前，欧洲还没

有别的高校开设此课”。他在1855和1857年先后发表《关于喀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史前的书籍》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简介》，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可以看作写文学史的前奏，在出版《纲要》之前不久，又用石印发表了他长期教学积累的讲稿《中国文学史资料》。到写作本书时已是水到渠成了。

作为文学史书来看《纲要》显得与众不同，它的内容不是单讲文学，而是几乎囊括了中国各类书籍。在第一节“几句开场白”之后，便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及文献问题”等三节介绍了产生中国书的条件和背景。以后各节就依历史为序，以儒学发展为线索，分两个时期来分别论述各类书籍。“儒学的第一个时期”中除了“孔夫子及其贡献”、“儒家的宗教及政治”等内容外，就是分立几节讲述几类书籍，既有儒学的“三部古书——《诗经》、《春秋》、《论语》”，也有“儒家的伦理道德基础《孝经》”和“体现儒家精神的治国理想《经书》”，还有“《孟子》”等。“儒学的第二时期”里分别设立“同儒学不相容的道教哲学家”，“佛教文献”，“中国人的科学发展”，“语言学、批评、古籍”，“中国人的农书、自然科学、兵书”等节，最后才是谈美文学的“中国人的诗文”和“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章回小说”两节。

这样，在总数十五节中谈到文学的内容只有三节（即加上《诗经》那不到一节的内容），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若从篇幅看，则文学内容约43页，占全书（163页）的四分之一。